

# 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的渊源及发展

涂人猛

在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存在有二种范型,一是通过城市——工业增长极的功能作用,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上而下的发展范型;另一种是强调城乡对立的恶果,主张以农村为发展重点,采取自下而上的内源式乡村发展范型。鉴于介绍和研究自上而下的增长极发展模式的论作已很多,本文这里仅对自下而上的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探讨,以期能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一点可供借鉴的依据。

自从50年代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增长极概念并被布代维尔(Boudeville)引申运用于地理空间研究开始,这种以城市——工业的功能为核心,通过功能一体化,带动经济传递实现区域发展(即后进和先进地区之间的一体化,是通过城市发展功能和基础结构的功能,扩散增长冲动,把经济增长完全扩散到空间经济的所有部分)的“极化增长”思想就一直主导着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在形成市场、积累资本、加速工业化、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发展。然而,这一理论在大多数国家实践中,并没有使区域经济增长自行产生“涓滴效应”,许多国家仍然普遍存在着农业落后、绝对贫困、贫富悬殊、人口危机、失业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客观的现实,迫使西方一些传统的经济学者承认,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平衡的、利益和谐的过程,而是经常背离这种平衡。“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变化并不一定就引起抵销变化,相反,引起的支撑变化会使这个体系沿着某个方面从第一个变

化继续向前发展,由于这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社会失衡会积累起来并加速发展”。<sup>①</sup>

与此同时,西方激进学派的发展经济学——依附理论迅速崛起。一些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弗兰克(A·G·Frank)、沃勒斯坦(Wallerstein)认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民,无论是在“核心”地区,还是在“边陲”地区,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全部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范围,这个体系靠一系列环节来联系,这些环节都帮助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并把它转运到核心地区消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决定性特点就是一个地区剥削另一个地区,从而呈现出一个“中心——边陲”的结构。由于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北美、西欧)的依赖关系,使边陲国家(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也即是“中心”国家的发达正是以“边陲”国家不发达为代价的,“边陲”国家并非因贫穷而造成依附,而是由于依附而造成贫穷。随着中心国家产业资本的大量输出,一些落后国家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一些经济学者批判了依附论中单方面强调“不等价交换”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依附理论。阿明(Amin)针对中心国家产业资本涌向边陲国家开发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剩余价值”作为研究重点,认为剩余价值的转移已不再以产生在流通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为主要形式,而以生产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为主要形式。伊文(Evans)等人认为,“发展”与“依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承认边陲国家内的发

展并不等于否定“依附”，而且，“依附”不仅紧紧伴随着发展，甚至随着发展而加深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外力制约下的边陲国家经济的确获得了较高速增长，政府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并且民族资产阶级也形成了，但这毕竟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有所不同，因为这仍然是没有摆脱依附关系的发展，是“低度”发展的发展，外力制约的发展与中心国家的自主发展是大相径庭的。

在区域发展研究中，大卫·斯莱特(David Slater)是第一个采纳依附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思想，并将其运用于不发达国家空间结构研究的经济学者。他通过对广大前殖民地国家区域开发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空间结构组织阶段理论，将不发达国家空间结构演变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前殖民地时期的空间结构(1880年以前)；(2)殖民主义入侵、原始积累和向内扩张阶段(1880—1914年)；(3)殖民地组织化及其继续向外扩张(1919—50、60年代)；(4)新殖民地的集中化和新独立国家经济有限调整时期(50、60年代以后)。他认为前殖民地时期的区域空间结构并不是以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为特征，而以发展中的区际贸易网络为特征，其空间结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聚集和相互依赖”；<sup>②</sup>资本主义的渗透，不仅没有使这些地区的空间经济网络变得更为整合，相反，却导致了它的内部分裂与外部联合的局面；在殖民渗透、集中化起始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移植，导致了为这有限的资本主义飞地服务的铁路系统和城市的建立，但这些城市并不必然成为当地经济依托的中心，而是作为殖民地帝国的货物集散中心，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媒介点，或作为保障殖民地安全而设的管理中心和军事中心；进入第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交通网络系统得到迅速发展，运输线路的联结使某些地区变成“线形经济”，而线形经济的产生又导

致邻近区域发生分裂，从而使资本主义影响在地域上得到广度扩展。第四阶段中，一些政治上已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仍依附于少数欧美国家，“殖民时期所形成的空间结构仍被僵硬地、明显地保留下来”。<sup>③</sup>而且，致力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使它们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史莱特最后得出结论，“只要空间经济仍然呈现出内部原子化，外部绳栓化的状态，发展就是不可能的”。<sup>④</sup>因此，只有完全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原先的空间分割才有可能被一种空间组织制度所代替，区际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换才能逐渐形成并日趋成熟。

从上述可以看到，战后初期，由于各国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增长，很少关心空间的平等思想，增长极理论广泛应用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实践中，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发展。然而，70年代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日益突出，依附理论的崛起，使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建立起的以城市——工业的功能为核心，带动经济传递实现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模式及其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论点遭到了普遍怀疑。针对传统战略忽视社会关系方面、福利政治方面与非物质方面及国家和国家内部出现的不平衡、不公平的发展格局，不能很好地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问题，人们开始把重点放在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满足下，提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战略。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迫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导致区域发展战略理论出现从城市——工业增长极——自上而下战略向内源式乡村发展——自下而上战略之转变。

城市——工业增长极战略的第一个替代战略是由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约翰逊(E·A·J·Johnson)提出的。他认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发展的动力来自农业而不是工业。首位型城市的发展模式，不仅阻碍了国家的发

展,而且这种分布所造成的人口大量地从乡村和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迁移也将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社会经济损失,这是“一个扰乱社会变迁秩序的令人痛苦的过程,它导致了本应用于发展、建设目标的生产性能力和创造力的大规模浪费”。<sup>⑤</sup> 约翰逊指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恰当”的廖士(Lösh)城市等级体系,从而在“普遍存在的乡村与寄生大城市之间的真空中”<sup>⑥</sup> 架设起联结的桥梁。但是,发展不应该从城市体系顶点的首位城市开始,而是要建立一个小城镇网络,并通过这一网络将乡村纳入更大的“功能经济区域”。为此,约翰逊提出进行集镇建设规划,这一规划包括三方面内容:①强调建立各种公共设施,包括受监督的市场、职业的和普通的学校、银行和信贷联盟、门诊所和康复中心;②要求在稻米加工厂或谷物仓蓄场等公共资本的投入方面进行协调,加大电力和道路建设投入,以便增强小城镇区位优势,吸引更多的资金;③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立新的工业固定资产。他试图通过集镇建设规划,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培育各种各样的对加强乡村——城市联系有利的相关经济活动,以便广大城镇及邻近地区变成真正的功能经济区域。

罗迪耐里和普特尔(D·A·Rondinelli and K·Ruddle)在考察了聚集体系贸易城镇、农村服务中心、中等城市及其服务设备、基础设施、生产活动后,认为城市中心功能加速区域(农村)发展,但因城镇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经济扩散功能失效。为了改变这种运行状态,他们塑造了一种“综合的农村发展”战略,强调应通过发展一系列的空间联系,创造和建立一个生产和交换的整体的系统,把投资投向具有战略性的地方聚集地,发挥中心和地方的资源和功能优势,通过改进农村地区与功能城镇的互动途径,输入农村所需要的服务、设备和资源,促使农业生产增长,农民收入

提高,引导传统农业向商品化经营转变,实现农村社区向工业化、城市化社区的转换和平等增长。而商品化农业所需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需要一个互相紧密衔接的综合城镇系统,为农村居民提供易于接近的服务。出于这样的考虑,罗迪耐里等提出,“在主要的乡村区域建立三级城市聚落——乡村服务中心、小集市、区域中心,并在这一等级体系中建立城乡联系和城市之间的联系”,<sup>⑦</sup> 把区域视为一个有组织的网络,使不同的节点(城镇)服务于不同的区域范围。而节点(城镇)之间,在功能上相互协调配合,各以其优势相互结合在一起,使得区域被最有效率的形式组成一个整体。因此,在任何一个优势区位的增长,都会自动地带动其他区位的发展,使区域效应达到最大。

罗迪耐里指出,这种综合城镇系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空间联系来实现的。社会和生产活动的转变,既需要一种连接恰当的空间结构,也要求通过自然、经济、技术、社会管理的相互作用的框架,将大小不等的聚落与专门化的社会经济功能联接起来。正是这种联接才构成了扩展交换系统,使综合城镇系统同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扩散效应,既有利于中心又有利于中心周围地区的发展,从而改变低度发展的社会状态。

由于约翰逊的建立“功能经济区”战略和罗迪耐里的“综合的农村发展”战略在实践中难以奏效,一些经济学家又建议落后的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应脱离世界经济或全国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任何试图将乡村地区更密切地纳入国家经济体系的战略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地区不平等的增长,而且这种趋势将使有的功能经济区的产生变得遥遥无期,除非依附的边陲国家与其宗主国脱钩,否则,没有一个区域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其“发展”的目标。在这种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下,一种新型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性空间封闭和农社区战略开始问世。

1975年, 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J·Fircleman and M·Douglass) 首先提出走“农社区”途径,<sup>⑧</sup> 认为落后区域的经济的发展, 应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农村经济, 尽可能少与都市经济发生联系, 并集中发展1—2.5万人口的农村区域, 强调规划和决策权应当分散, 以使这一区域范围的居民能够基本上为自身发展负责。这种规模的农村区域, 既可使其人口规模达到或超过提供基本服务所要求的门槛, 又能容许大多数人民参与决策过程。随后, 史特尔(W·stohr) 1977年又提出了“选择性空间封闭”战略,<sup>⑨</sup> 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从世界或全国经济体系中“有选择地脱节”出来, 主张“区域性关闭”, 强调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区域, 以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与区域外部发生联系, 以便使小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既能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规划其资源开发, 也能够滤出因与较大城市的相互联系发达的经济中心对它们产生的任何有害的“回吸”效果。

弗里德曼的“农社区”发展战略和史特尔的“选择性空间封闭”战略起源于对中心——外围模型的批判, 认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以及它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反映, 忽视了外国资本的作用, 忽视了贫困的问题。在他们看来, 以城市——工业增长极为核心的“功能”型区域规划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区位和一个城市系统内节点和网络的空

间组织; 而以乡村集镇为核心的“地域”型区域规划主要关心的是在一定历史范畴下, 特定区域内人力和自然资源的综合动员。“地域”规划是规划决策起作用的区域中被指导的内源行动。在这个必然成为政治过程中雇用的是规划区域范围内的人民, 并通过寻求促进规划区域内所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般方式来达到平等的目的。因此, 他们认为“地域”规划是促进区域发展的较好的“替代”途径, 强烈地倡议区域规划从“功能”范型向“地域”范型转变,

在弗里德曼的农社区规划中, 农社区是作为经济中的主要“推进型”单元, 以食品自给自足, 逐步减轻业已存在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条件的不平等为首要目标, 把发展看成是一种人类的历史过程、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人民既是客体又是主体, 他们应当参加各级决策过程; 自力更生既是这种进程的一种手段, 又是它的目的。这个进程既能发挥人民的创造力, 确保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利用资源, 也要能促进城乡差别的消灭, 并能利用适用的技术措施来达到这些目标。因此, 这一战略的实施, 要求:<sup>⑩</sup> ①在国内产生新的地方政府单元网络, 即农社区; ②下放权力, 改变中央——地方税制安排, 以便“每一单元都有充分的自主权和经济资源来规划和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计划”;<sup>⑩</sup> ③实现土地改革以保障财富回到农社区每一成员的控制之中; ④中央政府必须在财政、物质和技术资源上予以支持, 并承担具有国家意义的工程的建设。在分配国家资金上, 要保证区域间的平等, 在主要宏观经济参数上保持系统广泛的平衡。

一般来说, “农社区”发展战略比较适合于具有以下特点的地区: ①较低城市化水平(小于20%)的区域; ②正在上升的具有较大乡村人口密度(大于200人/km<sup>2</sup>)的区域; ③具有成簇分布的聚落形式区域; ④人民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区域。因此, 这一理论比较适合于亚洲、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发展。

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是西方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发展理论, 虽然其内还存在有许多庸俗成份, 但作为一种以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主要对象的区域发展理论, 其中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并运用于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

1. 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急于追求经济利益、强调经济增长的世界趋势中, 落后地

区被排斥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指导下,难以消除区域发展的不平等现象,城市——工业增长极限根本无法发挥其功能作用,实现区域总体发展。而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以“乡村”作为发展的基础,着眼于消灭贫困地区,改变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强调地区自主权以使地区内资金和力量朝着有利于地区发展方向集聚起来,使贫困地区形成造血机制。它比增长极理论更符合于大多数穷人和贫困地区的愿望,对我国贫困地区建立合理的空间结构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2. 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主张扩张地方政府的权力,强调人民参与发展决策的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提出要用多样化的方式方法来解决问题;极力强调推进社会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性,从而避免了增长极功能方法的缺陷,减少远距离决策的失误。但由于过分强调“闭关自守”,忽视农村与城市客观存在的必然联系,会使农村发展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事实已证明,城市具有农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职能,至于城市是否必然剥削农村,完全取决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方式及城乡联系的组织方式。自城市产生起,空间封闭就已成历史,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是必然趋势,并且只有通过这种联系,农村才有可能寻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建立恰当的城市与农村的联系网络,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3. 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要求发展计划向贫困地区倾斜,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基本目标,加强区域自成长能力,打破核心的主导地位,可以减轻或消除社会和空间的不平等。但是,由于这一战略的起点不高,不甚关注生产率的增长,往往造成生产力发展缓慢,使满足基本需求永远只是一种良好的、无法实现的愿望。

4. 内源式乡村发展战略深刻揭示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边陲殖民国家的剥削这一事实,强调应实行与发达国家实现

有选择性脱节的战略,然而,这一理论忽视了阶级的存在及其阶级利益的冲突,把边陲区域看作为白板一块,既无殖民统治遗留的痕迹,也无资本主义渗透的影响;而且内在社会是无缺陷的、平均的和民主的,既无乡村区域农民之间的差别,也无与劳动力性别分工有关的问题。

5. 任何区域发展战略的制订,都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发展目的。由于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从来就不是某种纯逻辑的过程,而始终是一种多种逻辑并行作用或混合作用的过程,并且不同区域环境或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区域经济的运行特征各异。因此,任何一种区域发展理论,无论是以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增长极“功能”模式,还是以乡村发展为基础的内源式乡村发展的“地域”模式,既有其独特的优势,也具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区域发展理论研究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制订时,具体分析各种区域发展理论的利弊,以及如何消除或减轻区域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的弊端,选择相适应的、有效的区域发展理论。

#### 注释:

①G·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区域》,伦敦达克沃思公司1957年英文版。

②③④大卫·斯莱特:《低度发展和空间不平衡:第三世界区域规划问题的研究》,《规划进展》1957年第2期。

⑤⑥E·A·J·约翰逊:《发展中国家的空间组织》,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

⑦D·A·罗迪耐里:《区域资源发展的空间分析:菲律宾案例研究》,《自然资源规划》1980年第1期。

⑧⑨J·弗里德曼和M·道格拉斯:《农社区发展:亚洲区域规划的一种新战略》,1978年。

⑩W·史特尔:《区域发展:拉丁美洲的经验和前景》,1957年。

(责任编辑 徐云鹏)